

文苑笔谈

风云际会 辰龙在天

徐成文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2024年是甲辰龙年。生肖动物十二种，辰龙是一个特例。辰龙不同于子鼠、丑牛等属相的是，它不是实有的动物，而是文化造就的灵物。

龙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虚拟动物。但在古代，以生肖遴选者的眼光看，龙并不是虚幻的存在。龙之所以能够与其他十一种生肖为伍，是因为古人相信世上真的有龙。

在远古时代，龙极有可能会曾被当作氏族部落的图腾。在中国神话里，始祖女神女娲伏羲均为人首蛇身形象。民间龙，犹如各种动物形象的集锦。“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闻一多认为，龙为图腾，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原始社会，部落林立，各有图腾，内中以蛇图腾最为强大。随着部落的兼并，各种图腾合并与融合，以蛇为基调，吸收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鬃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等等，最终形成了龙。

古代的人们还把鱼作为龙的后备军，于是就有了“鲤鱼跳龙门”一说。大禹凿山开龙门，鲤鱼跳龙门。跳龙门的时节在暮春三月，来自大海及河川的黄色鲤鱼，为追求化龙的理想，溯黄河而上，争赴龙门。龙门一跃，化龙的鲤鱼在通过龙尾之门的时，要经历天火烧尾的脱胎换骨，地位变，身份变，全在这一跳。黄河龙门，被想象为衡量这一质变的标杆。这与通过科考之门，步入仕宦殿堂的晋身门径，颇为吻合。

我国古代民间的龙崇拜最重要的内容在于治水的传说。晋代葛洪《抱朴子·登涉》有一段关于十二生肖的话：“辰日称雨师者，龙也；称河伯者，鱼也；称无肠公子者，蟹也。”以地支辰对应龙、鱼、蟹，三者均为水族；河伯为水神，雨师是司雨之神。“辰日称雨师者，龙也”，不仅表明辰与龙的属相关系，而且将辰龙的民俗文化底蕴和盘托出——行云布雨，辰龙之神物。

龙乃至尊之物，所以古代帝王服饰为龙袍，清代一般绣九龙，但从正面或背面看都是五条龙，合“九五之尊”的帝王称号。袍的下端排列着许多“水脚”，水上绣水浪，俗称“海水江崖”，包含着统一江山及延绵不断等寓意。

在靠天吃饭的农耕时代，风调雨顺，是上帝王下至百姓，有共同语言的重要话题之一。为此，人与天对话，与龙对话，传为风俗。祭龙祈雨的老风俗，源于零，殷墟卜辞已有记载。零祀祈雨，祭天即是祭龙，两者原本是一回事。《左传·桓公五年》说“龙见而零”，杜预注：“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也。”东方青龙屋脊黄昏由东方地平线升起，万物繁茂的季节到了，这时要祭天、祭龙星，为田野祈雨。

祭龙求雨，古人还要堆土龙。相传，土龙塑的是应龙。《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早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晋代郭璞注解，认为土龙求雨风俗源于这段神话。应龙本是天上兴云布雨的神。蚩尤制作兵器去攻打黄帝，黄帝请天上的应龙来参战。应龙的本领是以水克敌，它积蓄大量的水，对付蚩尤。应龙帮助黄帝杀蚩尤，战夸父，用尽了自己的神力，再也上不得天。天上没了司雨的应龙，雨水就少，使得下界常闹旱灾。“早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郭璞说，这就是土龙致雨风俗的来历。

祈雨请龙，赶上大气环流，天气形势无雨可降，人们请龙再度虔诚，祭龙再恭敬，天空照样没云。倘若请龙多日，天仍不晴，就晒龙。把“龙”抬到太阳下暴晒，表示惩罚。抬着龙在烈日下游行，让它体恤民情，尝一尝干旱的滋味。但晒龙也不是一味地暴晒，要适时地向龙身上泼一点水，大概表示恩威并用、情感沟通吧。经此折腾，到某一天恰巧天就阴了，雨就降了，人们会说这一招灵验。

中国的民俗节日中，有不少是与龙有关的。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有南宋龙灯的记载：“元宵之夜……草缚成龙，用青蒿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之状。”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有“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的诗句，说的就是由人舞动的龙灯。明清两代，舞龙灯之风更盛。舞龙灯并非传统节日，春节、中秋以至各种庙会均有此项活动。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龙是吉祥瑞兽，人们用灯模拟龙的形象，无非是取其吉祥除祟的含义。

农历二月二为汉族的“龙抬头节”。此时正值惊蛰，春分时节，民俗认为蛰伏一冬的龙在这一天抬头活动，以后的雨水也就多起来了。明人沈榜的《宛署杂记》记载：“宛人呼二月二日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委蛇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用面摊煎饼，熏床炕令百虫不生。”由于中国北方多旱少雨，将“龙”引入家中，图的是风调雨顺，于是就产生了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谣。

很多少数民族都有“祭龙节”。壮族的祭龙节在农历二月初，由村中户或数户人家轮流负担祭祀用的鸡、猪等祭品，以保人畜平安。瑶族祭龙节在农历三月三，活动包括祭谷魂、祭谷娘、祭盘古、祭玉皇、祭神农等。广西侗族流行耍龙灯，用竹片制成一条三四十厘米长的龙，摆一张八仙桌，两人围绕桌子舞动，跳跃嬉戏，配以有节奏的乐器演奏，有声有色，十分有趣。

龙腾盛世，天降吉祥。相比其他生肖年份，龙年或许真的更能带来风云际会的豪迈。

阅评

在动物世界中，鹰鸟的飞翔令人神往，狮虎之勇猛令人惊悚，但最触动我心灵的还是骏马在草原上奔腾；前蹄扬起，身微侧，目视前方，马鬃飞扬，如风如剑，射向远方。马奔跑起来四蹄大跨度张合，空间在奔跑中不断变化，前进的速度与奔放的激情震撼荒原。

考古学家对化石进行研究后证实，马属动物的祖先，在约4500万年前已在北美演化成型，叫“始祖马”，其个子矮小，身体如同狐狸般大小，以多汁嫩叶为食，前足有四趾，后足有三趾。直到400万年前，地球上才产生现代马。北美洲一直是马类动物起源和演化的中心，马从这里起源并向四周辐射。在史前冰川时期，马通过白令陆桥扩散到欧亚大陆，随后又进入非洲，成为非洲大陆动物群的重要一员。

1. 在一万年前，产生于美洲大陆的马却突然与其他一些大型哺乳类动物一起，在北美洲灭绝，至今原因不明。有的说是被狩猎杀光了，有的说是被野牛一类反刍动物淘汰了。幸运的是，当马类在北美洲灭绝之前，部分马群已经通过白令海峡迁徙到了欧亚大陆。哥伦布第二次航海到美洲，他的船上带着马，重新将马种输入美洲。这是马群在美洲大陆灭绝之后的再次登陆，故地重返，马回到了自己最早起源的故乡，人类的历史也从此改写。

考古学家发现的驯化马的证据可以追溯到大约5500年前的波泰文化，波泰位于现哈萨克斯坦北部。驯化马使人类历史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遥远的距离变得可以快速地跨越。我去匈牙利旅游，在那里了解到蒙古军队攻打匈牙利的历史。匈牙利的祖先来自蒙古的游牧民族，强悍的草原民族在传说中如附身于马上的神灵，长驱直入，无可匹敌。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绘成“几乎黏在马上”的人，“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

这一不畏艰险的游牧民族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前进，止步于中欧匈牙利大平原，从此在这里扎下根来。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多瑙河以东的匈牙利大平原，损失了五分之四的入口。

马与人类的结伴不仅助长了帝国的军事行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考古学家布莱恩·费根表示：“我认为将马用作战争武器是人类历史

史评

关于丹书铁券，最著名的莫过于《水浒传》中关于柴进的故事。梁山好汉大多为贩夫走卒，江湖匪类，柴进的出身在这群人中显得尤为尊贵。《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插虎旗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用了一阙《西江月》描述：“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龙孙。丹书铁券护家门，万里招贤名振。待客一团和气，挥金满面阳春。能文会武孟尝君，小旋风聪明柴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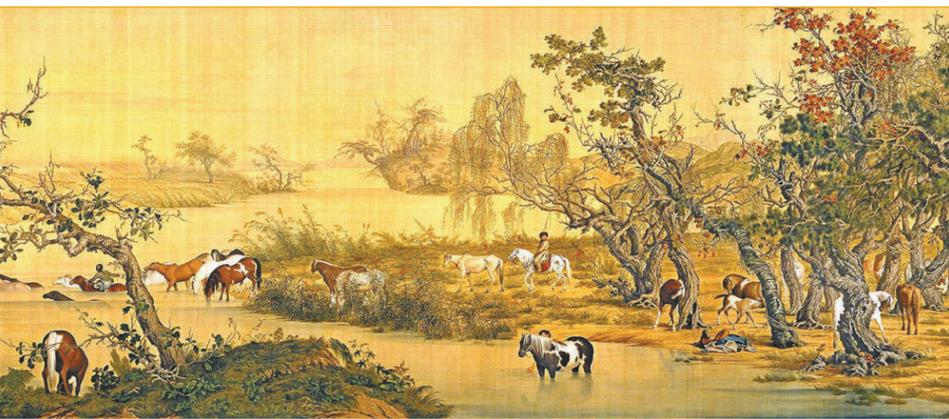
柴进曾自述“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可以看出，《水浒传》中柴进为后周世宗柴宗训后裔，故宋太祖赵匡胤赐其丹书铁券，这与历史上发生于景德七年(960年)的陈桥兵变相合。这一年赵匡胤于陈桥黄袍加身，柴宗训不得不“应天顺人，法老禅舜”，将帝位禅让于赵匡胤——将柴进称为“先朝凤子龙孙”，倒也并非夸张之辞。

那么问题来了：丹书铁券究竟是何方宝物，居然能让柴进有胆与当朝权臣争锋？如果现实生活中真有柴进此人，而柴进也的确有丹书铁券，那是否还会落得个落草为寇的下场？“丹书铁券”是一个统称，历代的叫法不一，两汉分别称为“丹书铁契”和“丹书铁券”，“契”与“券”相通，“丹书”则是指铁券上的誓词用丹书写。之后的《资治通鉴》《隋书》《辽史》中分别有“银券”“金券”“金券”之称，是源于书写材料不同所致。《明史》因铁券可世代相传又称之为世券，其实与丹书铁券本为一物，仅仅是命名角度不同罢了。

论及丹书铁券的诞生，就不得不提到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汉朝之前本无丹书铁券，据《汉书·高帝

人类历史上的骏马奔腾

王森



郎世宁《百骏图》



法国拉斯科洞穴中的“中国马”

史中与动物有关的最重要的事件。”马不仅成为人类的食物，而且达成了交通和运输的繁重任务，后来又成为人类战争中的重要元素。在中外历史上，古代战马和战车是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各种帝国的诞生扩张都离不开马。

远的不说，在二战时期，人类对于马的态度也有天壤之别。迪斯尼电影《白驹的奇迹》改编自西班牙骑术学校校长波达斯基上校的自传，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骑术学校的一段传奇故事。波达斯基接获命令，不准他继续办骑术学校。这道命令无疑等于下了一道灭马令，学习训练的欧洲马必将流落街头，成为军队或饥民果腹的食物，为此波达斯基心急如焚。经过各种努力，他说服德国勒勒将军将那批马迁往捷克境内。可是随着盟军胜利的扩大，为了保证马群完好无损，波达斯基找到了美国将军乔治·巴顿，请他帮忙，而巴顿将军又正好是著名的赛马爱好者，随后巴顿派出卡车队将马匹运往维也纳。利皮赞马这个有着历史传统的马种才在战火中幸存下来，战后西班牙马术学校才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2. 波达斯基千方百计保护的利皮赞马，被誉为世界上最优雅的马种，兼有阿拉伯和西班牙血统，是欧洲马匹中最古老的马种。这种白马的肤色很有趣，刚刚出生时的小马驹不是白色的，而通常是枣色或黑色，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肤色转变的整个过程在六至十岁之间完成，毛色就逐渐变成了白色。所以

说利皮赞马是白色的马实际上是一个常见的误解。据说追根溯源，现代这些马，都可以在出生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八匹基础血统种公马中，找到自己祖先的名字。

那一年在维也纳霍夫堡皇宫的西班牙骑术学校，我特地前往那间由建筑名家设计的全世界最美丽的马术大厅，观看骑手与马匹进行的晨练。维也纳的皇家西班牙马术学校是世界上唯一一所自文艺复兴以来始终以传统形式练习并演绎古典马术的机构。利皮赞马按照骑手的指令，表演古典盛装舞步的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给观众带来难忘的观感。

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马术比赛中，盛装舞步赛一项。盛装舞步比赛如同在跳华尔兹，无论动作多么复杂多变，人和马都显得气定神闲，风度翩翩，沉着而充满自信，表现出骑乘艺术的最高境界。每次竞赛完成，骑手都会弯下身体用双手轻拍着马的脖子两侧，完全可以感受到两者灵性的沟通。

马对于人类历史的进步意义深远，因此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占有独特

的位置。二十世纪初以来，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多国发现了一些洞穴中的史前壁画，人、野牛、野马和猛犸象等都是壁画中常见的生物。如果只用栩栩如生来形容，已经不足以表达那些壁画画面之传神和完美。因为画家笔触之生动，使人们相信现代的毕加索、马蒂斯等大师早已存在。在被誉为“史前西斯汀教堂壁画”“史前罗浮宫绘画”的法国韦泽尔峡谷的拉斯科洞穴壁画中有一幅“五马图”，中间竟然出现有一匹典型的“中国马”。所谓中国马，是画家的笔法线条简洁，平面却动态，与一万年以后中国画的画法极其吻合。

在相距万里之外，相距万年的时间，法国的隐秘洞穴中有一位画家在画着同样风格的“中国马”，这种巧合匪夷所思。上世纪20年代，在法国西南部一处洞穴壁画中发现的奇特马图案被称为“斑纹马”，专家考证预估可能绘制于25000年前。马身上的一块块斑点，像极了现代斑马身上的花纹，但是斑马一直被认为是近代现象，怎么会出现在远古时代的壁画中呢？难道是画家的主观创造？科学家们通过对欧洲地区15个考古遗址的野生马化石进行DNA分析，终于找到了证据：其中有6个野生马化石共同拥有“斑点皮肤”基因。约克大学考古系特里·奥康纳撰文指出：“远古野生马皮肤上出现奇特斑点图案，应当与迄今我们并不知晓的环境因素有关。”

3. 除了在维也纳近距离观看过利皮赞马的晨练，我还在新疆抚摸过来自

中亚的“汗血宝马”。走进汗血宝马饲养区，看着一匹匹黑色、棕色、深黄色的汗血宝马在马鞍里沉静地站立着，鬃毛细致，皮色闪亮。汗血宝马本名叫“阿哈尔捷金马”，主要在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繁衍生息，是世界上最古老、人工饲养历史最长的马种之一。汗血宝马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这类马狂奔出汗时，汗腺发达的马脖子部位肤色会变得特别鲜艳，仿佛被鲜血浸染一样。

最早关于这种马的描绘来自西汉的张骞。在一幅张骞出行图中，张骞坐于马上行于荒漠，在望不到头的高原上，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一带)出发，走上了出使西域之路。张骞历经13年，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国。他两次出使西域，原定的任务都没有完成，第一次企图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大月氏没有答应；第二次联络乌孙，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也没有实现。但是，张骞开拓的道路，后来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商旅要道——“丝绸之路”。

史书记载，张骞从西域归来时说：“(西域)多善马，马汗血。”他所说的就是世界马种中十分有名的“汗血宝马”。这种历史上最古老的马种，曾伴随曹操、成吉思汗、亚历山大大帝征战沙场，被誉为最有灵性的动物。“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好马速度和耐力的描绘，而当之无愧的恐怕只有汗血宝马。经测算，汗血宝马在平地上跑1000米只需要1分零7秒，即使在摄氏50度的高温下，汗血宝马一天也只需饮一次水，因此特别适合长途跋涉。汗血宝马性格暴躁，是荒原上的斗士，而不是官衙中的绅士。它们在马厩中沉静的雍容状态，是在养精蓄锐，是在酝酿着奔腾千里的力量。

我国马史专家认为，“汗血宝马”其实就是阿哈尔捷金马。专家曾对汗血宝马的“汗血”现象进行过考察，认为“汗血”现象是受到寄生虫的影响。现今，全世界阿哈尔捷金马的总数量非常稀少，一共只有3000匹左右，产于土库曼斯坦，并被当作国宝赠送他国。汉武帝曾被称为“天马”的汗血宝马作歌咏之、歌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流流赭。骋容与兮躔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为了获取汗血宝马，历史上汉武帝就曾发动过对西域大宛国的两场战争。根据《史记》和《汉书》相关记录，西汉王朝历时四年，靡亿万之资，倾举国之力，并为之付出了十万将士的生命，最终换回了骏马三千匹……但此后重装骑兵流行，成为战场主力，而汗血宝马的负重能力有限，因此到了南北朝时期，汗血宝马渐渐退出了战场。

2000多年前，崇山峻岭间，年轻气盛的张骞骑马走过高原间的崎岖山路。再见他时，他已须发斑白。如果没有马，是否还会有这一段“史”世传奇呢？

丹书铁券的岁月烙印

——文物里的法律故事⑫

江隐龙

《礼记》载，刘邦平定天下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敖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庙”。而“剖符作誓，丹书铁契”的内容，则是“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17个字——正是这17个字，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丹书铁券。

刘邦借丹书铁券“班爵割地，与下分赏”，而功臣也因被授予丹书铁券而享受“生则列侯以殊礼，死则赐其爵邑”的福利。由此可见，丹书铁券在其诞生之初的确具备帝王与臣子之间的“契约”之意。

汉初的丹书铁券，更近于荣誉而无法外之权更非免死承诺。持券功臣不乏获罪之人，如萧何便因“强买民田宅”“多受贾人财物”而入狱遭遣不得“应天顺人，法老禅舜”，将帝位禅让于赵匡胤——将柴进称为“先朝凤子龙孙”，倒也并非夸张之辞。

然而，在南北朝时期，情形悄然发生了变化。南北朝各势力分疆裂土的同时，汉晋数百年几近绝迹的丹书铁券突然大量出现，并摇身一变成了后人眼中的“免死金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兴礼乐，变华风”之后，北魏一度“赏赐无度，盈积私家，金券铁券，不死



唐昭宗赐给钱鏐的丹书铁券

之诏频以许人”。这一风气明显延续到了后魏王朝，西魏时期大将李穆曾受数字文券，宇文泰感激之余“特赐以铁券，恕其十死”，此处丹书铁券作为“免死金牌”，已然实至名归。

在南北朝不足200年的历史中，丹书铁券获得了极大的“延展性”。一方面，作为“免死金牌”的丹书铁券终于出现，另一方面，丹书铁券在政治军事活动中作用被极大拓展，这一切成为后世丹书铁券的“底色”，最终使这一器物在民间文化中被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隋末唐初，隋文帝杨广称帝，段达、王世充等七人因拥立之功“委以机务，为金券铁券，藏之官库。于时洛阳称段达等为‘七贵’”。此时的丹书铁券被称为“金券铁券”，得益于冶金技术不断发展，铁券上的誓文已能够用金银镶嵌。《隋

书》中未明言“七贵”的金券铁券是否有免死之权，但“七贵”无一例外均不得善终——这也不能怪铁券，而是乱世之中弄权者很难全身而退，这非一己之力所能改变。

隋唐易代后中国再次迎来大一统，唐高祖李渊如刘邦一样开始论功行赏，其在颁布的《褒勋臣诏》这道诏书中明确了诸功臣“一死”的法外之权。虽然其中未提及丹书铁券，但在《唐大诏令集》中，这一道诏书被归入“功臣铁券”篇，可知当时虽无名而已有其实。以此为基础，唐朝的丹书铁券开始有了相对固定的格式要求，其誓词包括赐券日期、受赐者的姓名、官爵、邑地，受赐者的功业业绩，册封内容与赋予特权，对受赐者的训诫……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日益严重，面对众多强悍悍将，朝廷根本无力掌控，故只得示怀柔之心。丹书铁券是其中的选择之一。如唐代宗面对李宝臣、李怀仙、薛嵩、田承嗣等藩镇，下诏“凡为安、史误罪者，一切不问”，并“皆赐铁券，誓以不死”。

现存最古老的一枚丹书铁券实物，正是在唐末的悠悠乱世中诞生的。乾宁二年(895年)，义胜军节度使董昌于越州称帝，建大越罗国，董昌部将钱鏐不肯相附，奉唐昭宗李晔之命平叛并取得胜利。董昌平定后，李晔大喜过望，拜钱鏐为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加检校太尉、中书令，并赐丹书铁券。

历朝丹书铁券能留存于后世者寥寥，而这一份“钱鏐铁券”居然历经千余年而得以传世。从这一份铁券中可以明确看到“卿恕九死，子孙三死”和“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两句，得此丹书铁券不仅免九次死，有普通的违法之举时有司甚至不能加以追究，这样的“免死金牌”确实是续命宝器了。

中亚的“汗血宝马”。走进汗血宝马饲养区，看着一匹匹黑色、棕色、深黄色的汗血宝马在马鞍里沉静地站立着，鬃毛细致，皮色闪亮。汗血宝马本名叫“阿哈尔捷金马”，主要在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繁衍生息，是世界上最古老、人工饲养历史最长的马种之一。汗血宝马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这类马狂奔出汗时，汗腺发达的马脖子部位肤色会变得特别鲜艳，仿佛被鲜血浸染一样。

最早关于这种马的描绘来自西汉的张骞。在一幅张骞出行图中，张骞坐于马上行于荒漠，在望不到头的高原上，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一带)出发，走上了出使西域之路。张骞历经13年，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国。他两次出使西域，原定的任务都没有完成，第一次企图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大月氏没有答应；第二次联络乌孙，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也没有实现。但是，张骞开拓的道路，后来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商旅要道——“丝绸之路”。

史书记载，张骞从西域归来时说：“(西域)多善马，马汗血。”他所说的就是世界马种中十分有名的“汗血宝马”。这种历史上最古老的马种，曾伴随曹操、成吉思汗、亚历山大大帝征战沙场，被誉为最有灵性的动物。“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好马速度和耐力的描绘，而当之无愧的恐怕只有汗血宝马。经测算，汗血宝马在平地上跑1000米只需要1分零7秒，即使在摄氏50度的高温下，汗血宝马一天也只需饮一次水，因此特别适合长途跋涉。汗血宝马性格暴躁，是荒原上的斗士，而不是官衙中的绅士。它们在马厩中沉静的雍容状态，是在养精蓄锐，是在酝酿着奔腾千里的力量。

我国马史专家认为，“汗血宝马”其实就是阿哈尔捷金马。专家曾对汗血宝马的“汗血”现象进行过考察，认为“汗血”现象是受到寄生虫的影响。现今，全世界阿哈尔捷金马的总数量非常稀少，一共只有3000匹左右，产于土库曼斯坦，并被当作国宝赠送他国。汉武帝曾被称为“天马”的汗血宝马作歌咏之、歌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流流赭。骋容与兮躔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为了获取汗血宝马，历史上汉武帝就曾发动过对西域大宛国的两场战争。根据《史记》和《汉书》相关记录，西汉王朝历时四年，靡亿万之资，倾举国之力，并为之付出了十万将士的生命，最终换回了骏马三千匹……但此后重装骑兵流行，成为战场主力，而汗血宝马的负重能力有限，因此到了南北朝时期，汗血宝马渐渐退出了战场。

2000多年前，崇山峻岭间，年轻气盛的张骞骑马走过高原间的崎岖山路。再见他时，他已须发斑白。如果没有马，是否还会有这一段“史”世传奇呢？

有宋一朝，朝廷对丹书铁券基本持保留甚至反感态度。北宋祥符年间，王沂公出使契丹，契丹客使耶律祥吹嘘其铁券，王沂公便回敬道：“铁券，盖功臣有功高不赏之惧，赐之以安反侧耳，何以辄及亲贤？”没有赏赐的东西就给一个，这完全是糊弄人的玩意儿！在宋朝，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官僚政治形态全面取代门阀士族政治形态，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丹书铁券的式微正是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

辽金之后，元朝并无丹书铁券制度，仅成吉思汗曾“赐誓券、黄金印”于木华黎，以助其经略中原。有元一朝，倒是有一“答刺罕”的封号享受“九罪弗罚”的特权并可世袭，与丹书铁券功用相似。

元朝虽无丹书铁券，但元朝之后情形再次逆转。《明通鉴》载：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将剖符封功臣，召朱濂议等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历据汉唐故事，量其中而奏之，上皆嘉纳焉”。至洪武二年(1370年)“大告武功，论功行赏，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铁券丹书，誓诸白水，河带山河，爰及苗裔”，丹书铁券由此迎来了最为辉煌的时代。比之于唐朝铁券，元朝铁券，明朝铁券在质地、券文内容等方面均有变化。尤为不同的是，唐朝铁券为单券，明朝铁券则与金朝相仿分为二通，一付给受赐人，一付置于内务府。

那么，明朝的丹书铁券，是否有“免死”功效？当然有，不过相对于唐朝动辄“恕十死”的做法，明朝铁券的规定相对保守。如大将军徐达在明初号称战功第一，被封魏国公，然依其铁券，徐达只能免死三次，其子免死二次。又如丞相、太师、位列百官之首的李善长，依其铁券亦仅“免二死，子免一死”。自明英宗始，宦官干政日渐增多，丹书铁券的颁赐又渐渐抹上强权色彩。终明一朝，丹书铁券可谓有“免死金牌”之名，却无“免死金牌”之实了。

丹书铁券在明朝更迭中几经起伏，最终以传世。从这一份铁券中可以明确看到“卿恕九死，子孙三死”和“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两句，得此丹书铁券不仅免九次死，有普通的违法之举时有司甚至不能加以追究，这样的“免死金牌”确实是续命宝器了。

历朝丹书铁券能留存于后世者寥寥，而这一份“钱鏐铁券”居然历经千余年而得以传世。从这一份铁券中可以明确看到“卿恕九死，子孙三死”和“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两句，得此丹书铁券不仅免九次死，有普通的违法之举时有司甚至不能加以追究，这样的“免死金牌”确实是续命宝器了。